

全球化语境下岭南文化的处境、机遇与应对原则

龙 其 林*

I. 全球化趋势与岭南文化的处境
II. 全球化为岭南文化创造的机遇
III. 全球化时代岭南文化的应对原则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的岭南文化发展影响巨大。资本的扩张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形成文化上的诉求，使岭南文化原有的多样性逐渐减弱，西方文化的同质化特征日趋明显。但因全球化并非均质的、同一的进程，而是呈现出相互交错的、互不平衡的态势，使得岭南文化依然均有保持自身特点的空间。文化格局中的中心与边缘位置并非永恒不变，边缘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活力，可以成为特定地域中人们的精神、情感寄托。文化具有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同层次，岭南文化面对全球化的强力冲击，一方面应该以发展经济、科技为原则，另一方面应坚持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性，取长补短，在融合中发展。

◆ 关键词

全球化；岭南文化；时代处境；发展机遇；应对原则

*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 longqilin670@163.com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科技的发展、各国联系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是全球经济、科技、文化不断沟通、交流之后的结果,它的突出表现在于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彼此之间的合作与互通有无;全球意识逐渐形成,地球村概念逐渐成为现实。全球化引起了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连锁反应,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忧虑。

一、全球化趋势与岭南文化的处境

全球化在给世界各国带来全方位的便利与合作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对于地域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担忧,资本的全球扩张与文化的整合使得地域文化呈现出模糊的面貌,本土文化有可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丧失主体性。在全球化带来的科技、经济、传媒、教育、社会等诸多领域同步化、同质化的过程中,地域文化也出现了原有特性弱化的情形。全球化的驱动力在于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全球生产方式的趋同性,资本的输出与增值相应地会引发文化观念的连锁反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方面最主要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它们借助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等,在文化上进行文化输出,使世界各国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观念出现趋同现象,各国文化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本土特征变得模糊。

从本质上而言,全球一体化导致的文化趋同趋势,根源在于西方国家具有科技、经济、教育等领域的主导优势,它们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拓展自身的文化辐射范围,并逐渐形成一整套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规则制定者,其科技、经济、教育的输出带有鲜明的价值诉求,从而使后发国家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换言之,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借助科技、经济等各领域的全面优势,利用国际合作与资本增值的机会,隐秘

地将后发国家纳入自身的文化覆盖范围,并凭借着强大的文化生产及输入系统对其进行持续的文化改造,从而最终实现后发国家的文化他者化,即西方化的过程。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全面进入中国大陆,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展,在中国大陆培养起了一批数量惊人的美国文化认同者,认同者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电影、音乐等推崇备至。借助全球化的过程,美国顺利地将自身的文化价值理念在中国大陆进行了传播,培养了自己的文化认同群体,从而缓慢地影响他国的原有文化生态。有学者将这一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输出与影响称为文化帝国主义,即“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同化他国的文化现象。”[1]P64

毫无疑问,中国大陆也正处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获益匪浅,但也面临着原有文化生态被异质文化进入、中西文化存在冲突与融合的问题。就岭南文化而言,其自身存在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影响性在减弱。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文化,考古发现证实,在秦朝之前岭南已有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青铜时代文化。经过长期的演化,岭南文化形成了四个组成部分,分别为本根文化(语言认同文化)、百越文化(原生的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南迁至岭南的北方文化)、海外文化(近代以来传入的异域文化),涉及范围包括文学、语言、宗教、建筑、戏曲、音乐、绘画、宗教、饮食、民俗等诸多方面。从现有的行政区域来看,它包括了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这三个省份、两个特别行政区。岭南文化可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版块,其中的广东文化是岭南汉文化的主体,囊括了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高凉文化。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岭南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中国大陆经济最为发达、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但是岭南文化的原有生态失去了平衡。其表现在,构成岭南文化的四种文化要素中,海外文化的比例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西方文化进入岭南文化的核心体系,形成了从服饰、电器到语言、观念的全面辐射。今天的岭南地区,除了粤北、粤东、粤西部分贫穷地区外,大多地方已呈现出受海外文化影响的表

现，从物质到语言、思想都流露出认同的趋势。相应地，则是本根文化、百越文化、中原文化的削弱，甚至一些文化要素变得岌岌可危。

从本根文化而言，粤语这种流行与广府地区的方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虽然其中有政府推广使用普通话的原因，但英语事实上与普通话一道构成了对粤语方言的巨大生存压力。广府粤语的萎缩程度较其他方言慢，但广西粤语萎缩已经相当严重，例如南宁的白话消失程度已经相当严重。在戏曲方面，一些曾经盛行一时的岭南地方戏剧逐渐衰落，后继乏人。正字戏本名正音戏，是用中州官话唱念、多声腔的古老稀有剧种。明朝初年南戏一支传入粤东，主要扎根于广东省陆丰市，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正字戏。现在已经成为地方濒危剧种，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秦戏又叫乱弹戏，明朝时从西北地区传入海陆丰地区，与地方民间艺术结合而形成西秦戏，主要扎根于广东省海丰市、陆丰市、潮汕地区以及福建南部、台湾等地。2006年，西秦戏同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筑方面，骑楼等传统建筑虽然保留，但都市发展已不允许传统建筑大行其道，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逐渐取代传统民居。传统岭南民居中将建筑与大自然结合，充分利用溪水、湖泊，与庭院结合，以石景为中心，纵深方向发展、三间两廊、左右对称等建筑传统在当前的岭南地区很难流传。文学方面，岭南文化贡献了如屈大均、梁启超、欧阳山、陈残云、章以武等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地域文化色彩鲜明的作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岭南文化的活力与特征，但是在中国融入全球化之后，文学领域的岭南文化色彩却逐渐削弱，近二十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文化所具有的自身特性开始变得模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逐渐接近，相似性不断增强。换言之，全球化进展使得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被遮蔽了，地域文化渐渐地被他者化、被统一化、实用化所改变，岭南文化的特征在减弱。今天我们应该追问的是：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是什么？敢为天下先、勇于吸收和接纳新鲜观念、敢于探索异域文化是否还是岭南文化独有的特质？与江浙、福建相比，岭南文化是否还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精神质地？表现在文化中，除了服饰、饮食、民居等物质层面的东

西外, 岭南文化在制度、精神深处是否还有近代以来人们引以为傲的品质?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 实际上是对全球化时代岭南文化或其它地域文化命运的深刻探讨。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经济的一体化所衍生出的产物, 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导致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全球化迁徙、价值观念的全面传播及接受, 必然会形成以资本、技术为载体的西方强势文化与以人力、资源为表现的后发国家弱势文化之间的碰撞。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 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决定了他们的文化扩张, 经济基础导致了文化传播的走势, 全球化的过程必然是以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为基础, 而以文化扩张与传播、接受、改造为表象的文化碰撞。在一般情形下, 西方文化凭借着资本与科技的优势而占据主导性、主动性, 它们朝着后发国家的广袤文化空间进行挺进, 从而某种程度上形成西方文化的征服与后发国家地域文化原生态的破坏、文化传统的流逝、民族特质的流失。

在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后, 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由媒介建构、可视可感的全球化视觉奇观, 并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而被世界各国民众所认识、阅读和接受, 形成日趋明显的全球化视野、地球村意识, 也强化了西方文化的覆盖范围与优越性,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民众对于地域文化的关注度持续降低。传统社会中的地域文化, 主要凭借着生活于此地民众的共同生活需要、文化诉求而逐渐形成, 他们有着对于安身立命的地域性产生的共同关注与参与, 并且形成一种文化凝聚力, 将这一地域的民众团结在文化的周边。但是现代传媒尤其是新媒体迅速崛起之后, 地域文化已经逐渐地在岭南地区的民众生活中呈现影响力减弱的趋势。岭南的文化、生活为成年人所熟悉, 他们熟视无睹, 而对充满奇异性的全球化文化景观充满浓郁的兴趣, 世界各地的生活似乎不再遥不可及, 而是成为了人们观看、阅读和讨论的话题焦点之一。民众的视野开阔了, 全球眼光形成了, 却很难再如以往对地方文化那么执著与热衷。现代传媒已经改变了岭南地区民众对于本地文化的关注与参与, 人们的心理空间增大了, 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感反而在削弱。这种文化上的全球化大多是通过现代风传媒的传播而形成, 是一种间接的文化经验, 它诉诸于民众的视觉、听觉而上升为一种时间上的历史感、空间上的熟悉感。它在增强对异域文化的熟悉程度的同时, 也相应地降低了民众对于岭南文化的体验与认同。

二、全球化为岭南文化创造的机遇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对文明作了严格限定，认为“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而说的”[2]P32，由于“人的安乐是有限度的，人的道德品质也是没有止境的”[2]P33。在此基础上，福泽谕吉将文明或者说文化界定为三个层次，由外到内依次为器物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他同时明确提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该强调全体民众的智力和时代精神，培养公众的民主、平等、契约、法律等观念，这比修建铁路、兴办工厂、建造炮舰更为重要。福泽谕吉从文明进化的角度认为欧美是最高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则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为不开化民族的代表，因此西方文明是日本的发展方向。福泽谕吉又指出了日本应该怎样学习欧洲文明这一问题，他曾反复强调学习器物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先后性、孰轻孰重的问题。福泽谕吉认为：“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变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似容易，实则不通”，“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2]P13。福泽谕吉认为，有了先进文明（文化）的人心（即观念、思想）、先进文明的政令（体制、制度、法律），先进文明的物质是不难获得的。

福泽谕吉的思想非常具有启发性。由于文化具有物质、制度、精神三个不同的层次，引进文化就必然会对原有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于涉及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级，因而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发展必然具有不均衡性。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借助海洋为渠道，不断向东亚地区进行扩张，以满足资本主义大生产需要，寻找商品销售市场与原材料资源。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与其它国家、地区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接触中产生相互影响，开始文化整合。“所谓文化整合，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交流时，所经历的一个协调、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会对弱势文化进行选择、适应、调整、吸收、创新，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

增加,最终使弱势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一部分。”[3]吴定宇曾提出,历史上中国文化进行过四次大整合:第一次肇始于春秋,基本完成于西汉;第二次起于魏晋,经南北朝而止于初唐;第三次发端于北宋,完成于明;第四次则始于鸦片战争,经近现代而至于现在,迄今尚未结束。从文化整合的视野出发,人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整合的必然性,“这就规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化整合的性质也是从传统到现代,任务是通过中外文化的整合,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文化。”[3]与中国历史上的前三次文化整合主要是中国文化主动吸收其它文化不同,近现代以来文化整合的主体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更多呈现出被动的姿态:“这次文化整合由于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去兼容统摄西方现代文化,居于弱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固有的特质也因落后和不合时宜而会被淘汰,习以惯常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撞碎,某些千百年‘从来如此的’规矩和风俗遭到破坏,旧有的文化习惯被打破,民族自尊受到损害,注定了整合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非常艰难,甚至是非常痛苦的历程。”[3]具体到岭南文化,我们既应该看到西方文化在物质层面(家用电器、服装装饰、饮食喜好)、制度层面(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知识产权、节日庆典、教育制度)到精神层面(生活观念、价值思想、文化追求)对于岭南文化所形成的巨大压迫力、裹挟力,又应该看到岭南民众对于自身生活习惯、地域环境、审美趣味、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文化习惯,理解在大文化整合时期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全球化过程与岭南文化本土适应力的冲突与调适。“我们不可能停留在过去对‘体’‘用’的理解和研究水平上。既然现代化的文化整合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进行,就应当以中华民族及其优秀民族精神为体,传统的与外来的文化为用,在新的基点上整合形成一种既是世界性的、又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3]岭南文化面对全球化的兴盛,应当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和核心价值观念,以此为基础直面异域文化,兼容并蓄,更新自我,从而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获得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新生。

随着全球文化的加速趋同,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对于地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热潮。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必然现象,它超越了地域、民族、文化的环境限制,但这并不否认一些地域文化现在并且将来依然

存在及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地域文化在全球文化均质的条件下焕发出引人注目的魅力与活力，如西方文化对于东亚儒家文化的重新认识与认可，另一方面则在于地域文化可以与全球化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在互动中激活双方的文化身份。全球化给地域文化赋予了一种趋向较为一致、文化母体大致相同的性质，它是否能够与地域文化兼容还需时间检验。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长期被漠视，它不拘一格，张扬自我，富于冒险精神，从而为长期受主流文化影响的中原文化带来一股强悍的、开放的新气息。中国近代以来的新思想、新变革，几乎都经过或者直接由岭南肇始，从而使中国文化和转型的方向发生变化。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后，强有力的文化输入震动了近代以来的岭南文化结构，刺激它重新敞开场域，更加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在文化阵痛中加速了文化的交流及重构，其结果是一方面岭南文化相当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岭南文化在接受、融化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后得以更新自我，延续开放格局，呈现出更加充沛、旺盛的生命力。

进入全球化以来，岭南尤其是广东非但没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呈现出文化的溃败状态，反而借此机会凝练自我特色，沉淀岭南文化底蕴：广东编撰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集成《广州大典》。《广州大典》历时十年编辑而成，收录了近两千年来的4064种珍贵广州古籍文献，共520册，为系统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弘扬更新岭南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让岭南文化尤其是广府文化之“魂”常存；广东收集整理全省的海丝史迹、充实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筹划《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编辑计划；面对全球化以来外来动漫文化产品的倾销，岭南文化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通过喜羊羊、灰太狼、熊出没、猪猪侠等国产动漫产品，激活了自身的文化创造力：2017年，广东省数字出版产值1800亿元，居全国第一；动漫业产值400亿元，占全国三分之一强，形成了体系健全的产业集群；游戏业收入1515亿元，占全国的73.9%。在全球化席卷各国的背景下，岭南文化因势利导，勇于探索，在动漫文化业迅猛发展，在全国形成了领军地位。

全球化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常常带来两极体验。人们一方面服膺于全球化带来的物质产品丰富、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方式便利等物质福利，但

另一方面又常常在这个过程中迷失自我,从而导致物质丰足与精神匮乏的矛盾。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不仅有追求物质产品、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还有寻找情感寄托、确立精神根基的内在诉求。全球化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更多是提高了人们对于物产产品、生活需求的追逐,而无法提供更为内在的情感与精神的满足感,相反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民众通过地域文化寻找精神寄托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人很多都是精神的流浪儿,失却了地方文化的寄托后,已经成为了流浪在他乡的异客。既然是流浪,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乡愁。乡愁是离开所生活的地域后而形成的情愫,是一种对出生地、生活地的认同与寄托。在曾大兴看来,“所谓乡愁,就是流动或迁徙在异地的人们对于家乡的一种回忆式的情绪体验,包括对亲情、友谊、爱情的回忆,对家乡的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的回忆,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忆等。”[4]形成乡愁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是因为离开了故土,情感失去了依靠,因而产生思念之情。在这个过程中,地域文化及其认同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情感世界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得以显现。岭南文化为民众提供了一种有所寄托的精神方式,其中包含着岭南地域文化的价值、人们的思维习惯、审美旨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地域文化为全球化时代之后的乡愁提供了一种治愈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族文化在岭南地区重新兴盛,祭祖、修家谱、建祠堂、佳节家族大聚会、兴建家族企业等现象至今不衰,反而有更加兴旺的态势。说到底,家族文化是一种基于地域生活空间而形成的血缘性文化共同体。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生活在相同地域的家族因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而结成一个较为团结的共同体,共同对抗社会中的各种不可预期因素。在漫长的生活中,基于地域环境而形成的家族具有强烈的血缘认同感、地域文化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岭南文化虽然逐渐退至边缘地带,但生活在此的人们依然需要寻找精神依托和现实团结,岭南文化提供了绝佳的人文资源、现实契机,因而也就可以借助家族发展的方式得以延续。

三、全球化时代岭南文化的应对原则

美国学者阿兰·伯努瓦曾这样概括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深刻变化：“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在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这才是全球化更深层的意义。”[5]P6全球化对于流动空间与地域空间的这种切割，导致了地域空间及其文化重要性的削弱，地域不再成为资本全球扩张的不可分割的因素。表现在文化上，全球化一方面拓宽了后发国家中人们的国际意识和文化视野，促使人们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观察、思考各类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地域文化的存在价值被动摇，不再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内核。相应地，传统社会中地域空间和地域文化紧密联系的结构被打破了，地域文化不再有着牢固的地理根基。从近代以来，岭南文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冲击，依然特质鲜明；但是到了全球化大生产时代以来，其特质渐渐消失，与江浙文化、闽南文化差异性缩小。

在全球化语境中，岭南文化既面对西方文化的压力，又有着自身存在的条件。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岭南文化需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岭南文化在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坚持以发展经济、科学技术、教育为基本原则。文化之所以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分，最根本的还在于文化所依托的国家、社会的经济、科技、教育等基本条件，这些构成了文化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的交流呈现出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不同层面，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作为后发国家中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必须积极汲取全球化的成果，尽快弥补自身发展的短板，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对话，确立自身价值。否则，经济衰退、科技落后、教育保守，最后将直接导致地域文化自信力的丧失。

第二，岭南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长远目标在于吸收西方精神文化的养料，锻造出崭新的文化内涵。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过巨大的挫折。18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同时进行改革，日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学习西方的制度、精神文化，然后再考虑学习物质文化，而中国则恰恰相反。福

泽喻吉在那时就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学习西方文化所存在的问题：“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可以用人力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2]P12，“某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2]P13。从文化的三个层次及其关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或许二者改革的成败并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岭南文化在面对全球化冲击的形式下，同样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物质文化可以购买、制造，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才是一种文化的根本，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耐心学习、吸收、改进。

第三，在吸收全球文化的过程中，一定需要注意弘扬和保持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特性的原则。如果一种文化的民族性、本土性消失，完全沦为他者文化的附属品、传声筒，则这个民族存在的根本价值和根基也就消失了。人们有一句俗话，叫做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东西越是民族的。这话辩证地厘定了全球化与民族化、地域化的关系，资本扩张带来的全球文化趋同现象是暂时的、表象的，只有各地域文化经过了异质文化的冲击后仍然保有的差异和个性才是内在的、本质的、深刻的民族属性。

第四，在注重地域文化的特征时，应警惕全球化生产分工导致的工业特点。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关系是相互对立而又合作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化的资本输出，它需要在不同的地域建构起一种分工明确的生产关系，从而将资本的扩张与增值结合起来，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将原料、市场产地进行文化上的确认。这是一种资本生产的需要，却借助了地域文化的概念。岭南地区数量众多的工厂生产着世界各国所需的不同物质产品，这也是岭南文化近四十年来形成的新内容，但是这种分工是资本输入之后制造出来的现象，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大生产的体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原生态的文化样式，需要认真对待。不应将由于全球化大生产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现代化分工及其形成的文化表征，看作是地域文化属性，它只是被商品化了的物质文化。

第五，注意利用政府的区域及其文化发展规划，助力地域文化的发展。一

个国家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经常需要借助行政性的区域及其文化规划，这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有力条件。区域文化与地域文化是两个相近却有区别的概念，地域文化是自然形成的，而区域文化则是人为主导和打造的；地域文化形成的时间较为漫长，而区域文化形成的周期相对较短；地域文化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区域文化则受政治、经济的影响更深。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很显然，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行政区域规划，但其中包括的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惠州、东莞、中山、江门等九个城市都属于岭南文化范围，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对于岭南文化尤其是广府文化的崛起也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科技上的交流、文化上的相互了解，使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能够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消除隔阂，促进不同文明的交融，有利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类和平，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强势文化的冲击，导致后发国家原有文化受到冲击、地域文化发展面临诸多压力。从整体上而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人们需要的不是回避，而是坦然面对、从容应对，从而为本国、本地区或地域发展带来契机。

參考文獻

- [1]孙洪斌.文化全球化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 [2][日]福泽喻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吴定宇.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代与未来[J].上海文化,1993(1).
- [4]曾大兴.文学地理学视野中的乡愁[J].文史知识,2017(11).
- [5][美]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A].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pportunities and Principles of Lingnan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Long Qi-lin*

Abstract: Since 1990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Culture.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inevitably form cultural appeals, which will weaken the original diversity of the Lingnan Culture and make the homoge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culture more and more obvious. However, because globalization is not a homogeneous and identical process, it presents a staggered and unbalanced situation, which makes the Lingnan Culture still maintain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position of the center and the edge in the cultural pattern is not eternal. The edge culture has its own unique vitality and can become th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sustenance of people in specific areas. Culture has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material, system and spirit. On the one hand, the Lingnan Culture should face the strong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eveloping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adhere to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 and region, learn from each other's

*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strengths, and develop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Lingnan Culture; situation of the time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principles of response

